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向警予



一、好学的童年

1895年9月4日在湖南省溆浦县城的一个商人的家里，有一个女孩呱呱落地了，她就是向警予。

溆浦地处湘西群山环抱之中。县城依庐山，傍溆水。庐山又名庐山，是绵延起伏的雪峰山余脉；溆水又称双龙江，是汇入洞庭湖的沅江支流。

春秋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相传被放逐曾经过此地，留下了《涉江》这篇诗作，叙述了诗人到溆浦后独处深山的孤寂心情，描绘了湘西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

向警予的家，是一栋老式的四合院，坐落在背街临水的溆水河畔。向警予的父亲叫向瑞龄，小时家境贫寒，曾以打豆腐、贩陶器为生。后来他勤俭持家，不辞劳苦，慢慢发家。晚年他担任过商会会长，成为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向警予的母亲叫邓玉贵，也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她生活俭朴，待人忠诚，为邻居们称道。她在向警予年轻时就病逝了。向警予兄弟姊妹共10人，她排行第九，所以她的乳名叫“九九”。

向警予5岁开始学习认字，认起字来，非常认真。1903年，向警予上了小学。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很多家长根本不愿女儿读书，更不愿送女儿上学，社会上很多人都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向警予在家人的支持下，是第一个上小学的女孩，在县城内开创了女子入学读书的先例。

向警予童年时代爱好学习，喜欢读书，读过《三字经》、《孝经》、《幼学》、《增广贤文》等。她更爱读屈原的《离骚》，对《木兰辞》则爱不释手。在平静的溆水边，每当清晨薄暮，向警予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岸边崖畔，或邀几个同伴聚在屋角灯下，朗读着《木兰辞》。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感人事迹，激荡着向警予的情怀。花木兰成了她心目中的英雄，她要向花木兰学习，也要成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英雄。

1907年，12岁的向警予跟着母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到常德的大哥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从此开始接触了民主主义思想。

她大哥是常德西路师范的教师，思想进步，称赞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后来到日本留学，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湘西同盟会的负责人。平日，他在家里议论时局，忧国忧民，给向警予幼小的心灵灌输了进步思想，成了她成长道路的启蒙老师。

在大哥和他的同事们的指导下，她经常阅读当时的一些进步书刊，如《新民丛报》及《民报》等刊物。这些进步刊物，激起了善于思索、勤于钻研的向警予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家里，向警予的兄弟姊妹十分友爱团结。大家常在一起谈论历史人物，评断功过是非。她总是积极地发表意见。大哥常给大家讲中外历史故事，每讲到中国古代的民族英雄和法国大革命的著名人物，她总是屏气凝息，百听不厌。

在学校，向警予是一名最勤奋的学生。她孜孜不倦，好学深思，刻苦钻研。学习中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她喜欢寻根问底，直到把问题搞明白为止，成绩总是班里最优秀的。她爱劳动，经常挑水、扫地，平时读书、写字、和人谈话，都挺胸直腰，很有朝气。她还注意锻炼身体，爱好体育运动，特别长于体操，曾代表学校参加县运动会的体操表演，并得到大家的称赞。

二、在周南女校

1911年，16岁的向警予就立志于教育事业，离开故土，进了常德女子师范。1912年她又转学到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在第一女师期间，向警予刻苦用功，不同凡响，受到学校师生们的称赞。

1914年秋，省立第一女师的朱剑凡校长由于思想进步，宣传进步思想而为当局所不容，被罢了校长的职务。向警予在女师期间非常爱戴这位朱校长，在朱校长那里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她在这时同几个进步同学一起毅然退学，转到朱校长主办的周南女校上学去了。

周南女校在长沙北门泰安里，是朱剑凡在1905年5月创办的。这个学校一开始叫周氏女塾，后来于1910年7月才改名周南女子师范学堂。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被编入师范第四班。她尊师爱友，善于学习老师和同学们的长处。在学习中，向警予从不局限于课堂所得的知识，而是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博览兼收，深入研讨。

三年级时，她们学习几何、物理、化学、国文、伦理学、作文、图画、习字、园艺等课程。向警予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并还能抽时间阅览大量的课外书籍。学校的读书楼，“四围绿树拱抱，幽静无比”，是一处绝佳的读书地点。向警予经常来到这里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由于她刻苦用功，疲劳过度，常常感到头晕眼花。但她决不抱病卧床，靠“守药炉”过日子，而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培养自己健全的体魄。每天起早参加体育活动，还约了20几个同学，经常在校园里练习拳术。

向警予平时团结友爱，热心服务，生活朴素，庄重大方。在省立第一女师时，学校组织乐群会，同学们一致推举她为“道德部长”，在乐群校刊上她常发表文章。到周南女校以后，许多同学把她当作可敬可亲的大姐姐，还称她为“向圣人”。又由于她喜欢钻研古代墨子博爱的哲学，同学也称她为“墨子”。向警予不仅是用功读书的学生，还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学校里的教员和学生都很喜欢她和尊敬她。

向警予身在平静的校园，心中却系着危机四起的祖国。来到长沙后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她心潮起伏，不能平静。她胸中孕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决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她在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拯救中国，才能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呢？

在这灾难深重的年月，蔡和森、毛泽东先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了他们在长沙的学习和战斗的生活。

蔡和森来自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县）。他出生于一个寒苦的小职员家庭。4岁时，由母亲葛健豪从上海带回永丰老家。小时读过私塾，当过3年学徒。1913年春，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秋季，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编入第六班。

毛泽东1913年春季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季，由四师并入一师，编入第八班。

在长沙，向警予认识了蔡和森。这时，蔡母葛健豪，蔡姊庆熙及女儿刘昂，蔡妹蔡畅都来到了长沙。1917年，蔡家搬到岳麓山周家台子的“浣痴庐”。长沙的一批青年，常到岳麓山蔡家研究学问，交流心得，探寻真理。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问世。以《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创刊号上刊登的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针对袁世凯

的帝制复辟和尊孔复古，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接着，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大钊，也参加领导新文化运动。他们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都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们受《新青年》进步思想的影响很深。

1915年下半年，向警予在周南女校写了十篇作文。这些文章，文笔流畅，字迹清秀，批评时政，尖锐泼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反袁斗争，很有现实意义。

当时，社会上的一部分青年，在内忧外患的国难关头，完全没有兴邦救国的志向。有的安于现状，不求上进；有的沉缅酒色，追求享乐。向警予曾写文章号召青年们要振作起来，现在不是贪求安逸的时候，也不是讲求穿戴的时候，一定要革除陋习，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向警予在1915年就开始忧虑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她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决心投身到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三、青春似火

向警予在周南女校学习期间，社会上流行“教育救国”的主张。不少人以为在不变更现存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振兴实业，讲究科学，兴办教育，中国就有前途和出路。他们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向警予也受到这种社会主张的影响，觉得只要联络一些同志，下定决心，努力办好教育，就可以救中国。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就开始注意考察社会教育状况。她在日记、作文和通信中，详细地论述了学校校舍建筑、教授方法、儿童特点等方面的问题，对于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很有一番抱负。

1916年夏，向警予在周南女校毕业。她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回到了家乡。她一到家乡，就开始筹办淑浦女校。其中，最棘手的是经费问题。为了筹措办校的经费，向警予首先设法争取县府的支持。由于她的奔走张罗，得到县府和家庭的支持，9月，学校筹备工作已有头绪，11月21日，学校正式开学。

学校开学了，但前来报名的学生很少。开学一周，学生只有几十人。为了让更多的女孩子入学，向警予又向县府建议，由县府颁布文告，要求四乡的家长送女孩子上学。但向警予知道，仅凭一纸文告，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她决定亲自深入山区，反复宣传，动员各家长支持办学。

向警予一个人从县城出发，带着包袱雨伞，顶烈日、冒大雨，走遍四乡，到处劝学。最远的龙潭，有150多里山路，要经过一段荒无人迹的地方，翻越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每到一处，她苦口婆心地向家长宣传男女平等思想，说明女孩子上学的好处。家长们为她的精神所感动，听了她的劝说，觉得很有道理，纷纷送女孩子入学。前来报名的越来越多，连20多岁的大姑娘也报名上学了。

第二年，报名入学的女生更多了。向警予把学生当作亲人，对她们的关怀无微不至。晚上，她亲自检查每一个寝室，为学生盖被；早上，帮助小的女生梳头。冬天，给学生生火取暖；夏天，为学生驱逐蚊虫。

每当清晨，向警予常常亲自摇起床铃。学生起床后，就举行朝会礼。迎着晓风晨雾，校园里传出了嘹亮清脆的校歌：“美哉，庐山之下淑水滨，我

校巍巍矗立当其前。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的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世界呀；大放光明！”

朝会礼毕，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作早操。向警予还编了一首运动歌。歌词是这样的：“运动，运动，运动乐，不怕天寒和地冻，各把精神来振作，肌肉强，血脉活，运动，运动，运动乐。”

在向警予的主持下，淑浦学堂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学堂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宣传新思想，使偏僻的山城风气为之一新。

两年后，在向警予的主持下，淑浦学校办得更加有生气了。她一面办学，一面在考虑今后的事业。她把自己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鄙弃当时一些青年，只从一己的私利出发，计较荣辱得失，把天下大事放在脑后。她明确地主张“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在她的心目中，虽然“真事业”还是比较朦胧的，但她愿意干一番轰轰烈烈的“真事业”的决心却是十分坚定的了。

1918年6月，她为学校经费的事给县府新任谢知事写信，表示自己打算辞去校长职务，“退而自修”，继续深造的意愿。目的是为了将来全力以赴地去干一番“真事业”。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发起成立进步青年的团体——新民学会。

毛泽东、蔡和森在一师学习时，就同何叔衡、张昆弟、陈昌等人志趣相投。他们之间联系密切。岳麓山蔡家和城内楚怡小学，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经常就个人及人类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渐认识到，要改造中国，不能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有一群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同志，结成一个团体，向外发展。

1918年4月中旬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一群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应蔡和森、毛泽东的邀约，在长沙岳麓山蔡和森家，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瓚、何叔衡、罗章龙等13人。新民学会后来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到七八十人，成为一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战斗队伍。

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召开的时候，向警予正在淑浦办学，消息传来，她受到很大鼓舞。她外出寻求真理，寻找出路的心情更为迫切了。

1918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学会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会上一致认为留法运动很有必要，应当马上进行，于是决心推选蔡和森去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问题。

向警予这时虽然还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但向外发展的想法同蔡和森是不谋而合的。

同年的秋后，向警予把淑浦学堂的校务暂时作了交待，只身从淑浦出发，也到了北京，她在北京与蔡和森重逢。他们有机会在一起畅谈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9年春，向警予带着新的希望，回到了淑浦。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长沙，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斗争。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淑浦，向警予马上带领师生上街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整个县城沸腾起来了。

向警予兴办学校，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穿耳，早已引起地方封建势力的不满。现在她又宣传反帝爱国主张，组织游行示威，痛骂贪官污吏，更使地方上少数顽固官吏士绅惊恐不安。这场斗争，也必然会在家庭中反映出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向警予发现自己的志向同父母的愿望产生了矛盾。她意识到这是一场斗争，自己的政治热情决不能为家庭儿女私情所淹没。于是，她和家庭开始了最初的决裂。

1918年底，驻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曾派人到向家来说媒，要娶向警予。周则范向向警予求婚，是想找她这样的新女性，为自己装饰门面。向警予的父亲想利用周家的权势，也倾向于同意这门婚事。

但是，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向警予非常清楚，这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她决不能在封建势力面前屈服，要作争取婚姻自由的新女性。

一天，向警予亲自来到周家，当面拒绝了周则范的求婚。一个年轻的女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慕封建军阀的权势，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在个人婚姻问题上独自作主，这该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她要在今后从事的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去结识真正的同志和战友。

长沙求学时的相识，北京重逢时的相知，使向警予对蔡和森产生了敬佩之情。她曾对女友说：“蔡和森和毛泽东是我的契友，我的思想感情是倾向他们的。”

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已有头绪，要妹妹蔡畅赶紧联合省内女界组织留法运动，特别是要通知向警予，邀她和蔡家一道去法国。

向警予接到蔡畅来信，非常高兴，决定马上动身去长沙。

一天清晨，向警予乘船离开溆浦，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小船开动了，向警予挺立船头，向大家挥手，鼓满风帆的木船渐渐远去，消失在青山绿水之间……

四、参加新民学会

1919年8月，向警予到长沙，就住在蔡和森家。

这时的长沙，新旧思想正猛烈交锋。卢梭的《民约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代替了过去封建的圣经贤传。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这里传播。一般追求真理的青年都是爱国有心，救国无方，因此，都在寻找救国的道路。

在新旧思潮的剧烈斗争中，湖南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向警予是《湘江评论》的热心读者，也是毛泽东进行爱国学生运动的战友。

周南女校学生中，原来有一个“南化会”的组织。向警予是“南化会”领导成员之一，经常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1919年下半年，在新民学会会员的影响下，周南女校学生纷纷加入新民学会。向警予这时正式参加了新民学会，成为最早的女会员。

11月，新民学会全体会员在周南女校召开会议，欢迎新会员。会后，新民学会的活动开展得更有声势，更有影响。

向警予等新会员主办了进步刊物《女界钟》，这个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宣

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对童养媳，提倡妇女解放，在长沙广大群众中和妇女界很受欢迎。

争取婚姻自由，是争取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旧时中国妇女经济不能独立，依赖男子生活，无数妇女在罪恶的婚姻制度下，过着终日以泪洗面的生活。不少人甚至被不合理的婚姻折磨得送掉了生命。

1919年11月14日，长沙的一个女子赵五贞，因不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用剃刀在花轿中自杀。这件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立即震动了全城。

赵五贞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找向警予一起商量。毛泽东提议说，应该开一个会，表示女界的态度。向警予同意这个意见，立即和周南女校的同学筹备召开纪念赵五贞大会。刚刚在溆浦亲身经历了一场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的向警予，积极带领战友们参加了这场抨击封建制度、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

五、“向蔡同盟”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人提倡，1918年才全面出现热潮。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初发起人是蔡和森。关于女子留法问题，蔡和森和萧子昇一开始就作过考虑，后来蔡和森办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手续，便马上写信回家，动员母亲和妹妹蔡畅一起赴法，并建议向警予和他们同行。

向警予到长沙后，和蔡畅等一起发起湖南女子勤工俭学运动，筹备成立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10月，她们以周南女校为试点，成立了周南女子勤工俭学会。11月，在周南召开湖南女子勤工俭学成立大会。

1919年12月初，向警予、葛健豪、蔡畅等，离开湖南，到达上海。这次湖南赴法女子一共6名，特别是年已54岁的蔡母葛健豪出国，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

蔡和森从北京到了上海，决定和他们一道赴法。毛泽东从湖南经武汉到上海，准备为他们送行。

这时的向警予，还没有机会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社会问题不可能得出确定的见解和主张。中国究竟实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实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她还不是很明确。她脑子里装的主要是“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男女平等”、“民主自由”、“劳工神圣”、“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概念。她渴望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找到革命的真理，成为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

孙中山这时在上海。向警予怀着敬慕的心情，专程到孙府拜望，和孙中山毫无拘束地纵谈国内外大事。

12月25日，下午一时，向警予和蔡和森、葛健豪、蔡畅等30多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央克来蓬号海船。送行的有留法俭学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代表共数十人。他们远渡重洋，开始了赴法的漫长旅程。

在漫长的旅程中，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研究政治和学术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友谊更加发展了。

邮船在浩渺无际的海上航行。一望无涯的暗绿色海面，时而碧波万顷，时而狂涛怒浪。海上生活整整渡过了35个昼夜，从太平洋，经印度洋、红海到地中海。沿途经过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孟买、亚丁、开罗、最后到法国马赛。

航程中，向警予和蔡和森经常在一起谈心。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他们在船上还合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向上同盟》，表示在革命的征途中，要相互勉励，共同向上。

1920年2月2日，漫长的旅程结束，他们从马赛转乘火车到达巴黎。

巴黎，这座英雄的城市，在巴黎平原的中央，可以看到凯旋门、公社墙、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名胜古迹。塞纳河水横贯全城，两岸风光秀丽，景色如画。向警予早就向往这个美丽的城市。但这时却无心欣赏异国风光。第二天，她和大家一起找到华法教育会。

向警予、蔡和森到华法教育会，经过联系，分到离巴黎不远的小城蒙达尼。蒙达尼设有男女两所公学，两所学校相距很近。他们每天都可见面。蔡和森进了蒙达尼男子公学，向警予、葛健豪、蔡畅等则进了蒙达尼女子公学，首先学习法文。

开始，最头疼的是听不懂法语，看不懂法文。大家感到，到外国来，外国语言文字就像一把锁。锁没打开，就像得了聋、盲二症。向警予和蔡和森虽然在北京学过一些法文，也仍然感到非常困难。向警予每天从早到晚苦练法语。她耐心地翻阅字典，一字一句地查出原意，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短短的几个月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他们一边学习，还一边做工。蔡和森和向警予一起参观了蒙达尼豆腐公司。后来，向警予到纺织厂、树胶厂做过工，还和蔡畅一起到附近的豆腐公司做工。

在蒙达尼学习法文，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子里，向警予和蔡和森之间的爱情更加深厚了。

当时，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男女之间自由恋爱被看成伤风败俗的事情。向警予和蔡和森都很厌恶这种陈规旧俗，毫无顾虑地公开了他们的关系，用自由恋爱的实际行动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宠。

1920年5月，他们在法国蒙达尼结婚。在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又有意义的婚礼。几十个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参加婚礼，热情祝贺他们的自由结合。向警予和蔡和森在婚礼上朗诵了共同编写的《向上同盟》的诗册，后来大家都把他们俩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葛健豪很疼爱这个儿媳。她看向警予平时穿着很朴素，结婚的这天特地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绸衣。向警予盛情难却地对婆婆说：“我是不穿这样的衣服的。但是为了您，我今天就穿一个小时吧！”真的，只穿了一个小时，她就脱下绸衣，仍旧穿上了平常那件布衣服。

婚后，他们给国内亲人寄的一张结婚照片上，两人肩并肩地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表明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

六、蒙达尼会议

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和向警予到法国后，新民

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在蒙达尼，他和国内的毛泽东有密切的通信联系，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了一个整体。

在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有的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也有的受了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影响，对“温和革命”论觉得容易接受，对暴力革命论则感到太“激烈”，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怀疑的态度。

1920年7月初，蒙达尼公学放假了。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从各地来到这里，准备举行一次聚会。

从6日到10日，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璋、张昆弟、罗学赞、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萧子昇等13个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召开了5天的会议。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蒙达尼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和提出了用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

会上，蔡和森提出了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因此，他们主张先要组织一个共产党，这个党应当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和领导者，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以萧子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主张温和的革命和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由于这是一场重要争论，对于多数参加会议的人，特别是对于临开会前才到蒙达尼的人来说，都觉得比较突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充分展开讨论。会后，蔡和森和萧子昇都写了详细的信给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

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中的这场争论，在长沙的会员中也有反映。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1921年元旦，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在长沙召开新民学会会员的新年大会，讨论了新民学会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法等问题。会上，首先由毛泽东报告蒙达尼会议上会友对于上述问题讨论的结果，然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批判了会员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还介绍了北京等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这时，他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蒙达尼会议和长沙新年大会的召开，使新民学会这支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队伍在思想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加蒙达尼会议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后来有8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蒙达尼会议可以看出，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同时，周恩来也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11月，周恩来到欧洲，先后在德、法等国勤工俭学。

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600多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高潮。从湖南、四川两省去的人最多，其中除湖南去的以外，四川去的有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

在法国近30所学校的600多名勤工俭学生，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和法

教育会的刁难，生活一天天陷入困境。很多同学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无法租房子，无法解决吃饭问题，更谈不上学习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忍无可忍，终于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斗争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除新民学会组织以外，1920年2月，李维汉、罗学瓚、张昆弟、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其宗旨是“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蒙达尼会议以后，蔡和森和向警予在勤工俭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向警予给大家的印象是对待朋友充满了热情，好象兄弟姐妹一样。她的作文和书法是非常杰出的，并有天赋的演说才能。她待人诚恳，漂亮温柔，是一位招人喜爱、有才气的姑娘。

在蔡和森和向警予周围，有不少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是李维汉、蔡畅、李富春、陈毅等。

在整个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向警予表现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受到同学们的敬重。在任何时间地点，她总是站在斗争前列，是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

1921年，她曾参加领导勤工俭学生反对北洋军阀驻法公使馆和进驻里昂大学的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二·二八”运动。

1921年初，分散在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面临着无工做、无饭吃、无书读的威胁。巴黎近郊有数百人在那里候工不得，靠领每月5法郎的救济金生活。华法教育会接着又发出通知，拒绝继续发放救济金，甚至污蔑这些学生是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这引起了广大勤工俭学生的愤怒。

1月下旬，勤工俭学生派代表到巴黎，要求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解决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问题。向警予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曾赴巴黎参加斗争。

28日晨，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在巴黎示威游行，派代表到驻法公使馆，向驻法公使陈策提出生存权、求学权的要求，解决入学和救济金问题。

以向警予为首的4名留法新民学会会友，突破阻挠，参加了请愿斗争。包括唯一的女代表向警予在内的10人代表团，由蔡和森带领，直接找到陈策，进行说理斗争。100多名勤工俭学生集中在公使馆花园中，等候陈策的答复。经过不妥协的斗争，最后陈策不得不答应“借款维持”学生的生活，华法教育会也答应为失业的学生找工作。斗争以勤工俭学生的胜利而暂告结束。

第二次斗争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二·二八”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学生的正当要求，但迟迟不予解决，继续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

这时据国内报刊报道，法国政府在里昂办一所中法大学，招收部分留法学生。不久，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创办，校址为里昂的一个旧炮台。消息传来，留法勤工俭学生奔走相告，以为求学有了出路。

但是，当学校快开学时，却从国内招来了120名富家子弟，无理排斥了勤工俭学生入学。驻法公使馆同时宣布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到9月15日停发，此后即同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联系。这样，近800名勤工俭学生到了

无路可走的地步，终于爆发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运动。

在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等的号召下，9月17日，他们在巴黎召开会议，组成了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大会一致决定，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9月21日晨，占校先发队集合，共125人。他们冲进校园，占据了一座楼房，准备与校方继续谈判入学问题。陈篆又一次勾结法国当局，派出几百名军警。104名先发队员被捕后囚禁在一个兵营里。

被捕的学生在兵营中关了20多天。10月13日，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把蔡和森、陈毅、张昆弟、罗学赞等104人武装押送到马赛。18日深夜上船，随船有法国武装军警押送。至此，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结束。

11月15日，押送蔡和森等人的船到香港，船上的法国军警撤走，蔡和森等20多人上岸到广州。一周以后，改乘招商局轮船到了上海。上海各界组织代表到码头欢迎。陈毅代表“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发言，控诉北洋政府与法国当局迫害勤工俭学生的罪行。

不久，向警予也从蒙达尼回国，开始了她新的战斗生活。

七、妇女部长

向警予从法国回到上海，已是1922年初了。回国是为了战斗。这时，蔡和森经陈独秀介绍，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向警予随后于1922年初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3月间，正当春寒凛冽的时候，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的王一知和丁玲一道去看望向警予。王一知1920年以后到淑浦女校当过教师，早就想见见向警予。丁玲的母亲和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同学。一路上，王一知既紧张，又高兴。紧张的是，见到向警予后如何倾吐对她的敬慕之忱？高兴的是，向警予是一位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可以经常得到她的教益了。

向警予和蔡和森刚到上海，住在一个弄堂房子的楼上。王一知随丁玲稳步登楼。到了楼上，只见一个身材不太高，穿着一件湖南青布棉袍，头发剪得很短，前面有几根刘海，年约二十六、七岁的女子欣然出迎，亲切地和她们握手，邀请入室。向警予虽然刚从法国回来，但是举止装束没有半点洋气，还保持湖南乡下的本色。在谈话中，她亲切的微笑，温和的眼神，朴实平易的言辞，使王一知初见生人的窘促之感很快就消失了。王一知告诉她，去年曾在淑浦女校教过书。她听后很高兴，连忙向王一知打听学校的情况，还和王一知谈到淑浦的风俗人情，十分融洽无间。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蔡和森和向警予都出席了大会。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主编《向导》。大会还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一妇女部，向警予为当选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的第一任部长。

党刚刚成立不久，一些女知识青年来到上海。她们有的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的摆脱旧式婚姻的束缚，立志寻找党的组织，从事妇女解放运动，有几个还分配到向警予领导的妇女部工作。

1922年4月1日，向警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蔡妮。孩子出生后，无钱请奶妈照料。她和蔡和森忙于工作，又要料理家务，哺养孩子。因交不

起高昂的房租，他们常常搬家，住的都是十分简陋的地方。

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党的二大以后，向警予决定借去南方联系工作的机会，顺道回湖南一趟，把女儿送回长沙蔡家哺养。同时，她也很想念周南女校的战友和淑浦学堂的师生。8月，她到了长沙。

在长沙，向警予看望了几位过去的同学和女友。

故乡淑浦在吸引着向警予，她是多么渴望回到久别的故乡啊！她在长沙停留的时间不长，把女儿委托她五哥哺养后就回到了淑浦，这是她自1919年离开淑浦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向警予来到她亲手创办的淑浦学堂。这里的学生已一批批毕业，不少参加了革命的行列。杨德群、任培道等教师也先后去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等校学习。她看望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把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宣传品送给学校老师。

父亲已年近80岁，后母的身体也不好，二哥更是重病在床，家里人都希望她能多住一些时间。但是，她有革命的重任在肩，在家里只住了2个多月，就踏上了赴上海的归途。

经长沙时，向警予得知二哥病逝的噩耗。在痛苦难受之余，她给父母、二嫂和六哥分别写了信。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此次远行，在常人眼光看来本属不近人情，盖居家未及三月，又值二哥性命危笃之际，唉！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

向警予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回到长沙时，她又见到女儿蔡妮，其欢乐之情，溢于言表。她在给父母亲的同一封信中说：“妮子见儿即点头跳跃欢笑不止，此儿极趣！”

父母、兄弟、子女、母校、故乡、亲人，这一切，都使她难以忘怀，不忍割舍。但是，她却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她安慰二位老人说：“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唯一光明唯一希望吗？”“儿亦当格外奋发、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这些信，展现了向警予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坦荡的胸襟，多么感人的情怀！

1922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北京。向警予也来到北京，继续从事妇女部工作，还协助蔡和森参加了开辟北方党的一些具体活动。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政治性罢工。反动军阀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疯狂进行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三月，中共中央机关由北京迁回上海。向警予和蔡和森又回到上海。

八、领导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为了组织统一战线，推动中国革命运动，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人。向警予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次大会，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会后，妇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妇女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上海爆发过多次女工罢工运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上海新闻、闸北一带丝厂38家，爆发了1万多名女工的大罢工。

新闻、闸北这一带丝厂林立，女工有八九万人。她们所受的剥削较一般

男工更为惨重。每天4点起身进厂，路远者3点钟即由家起身，每晚6点半钟放工。在厂房里，她们终日工作，无一息之停，还要受唾骂毒打。

1922年8月5日，泰来丝厂女工首先起来罢工，向厂方提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附近各丝厂女工纷纷响应，也举行了罢工。但罢工以失败而告终，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完全没有实现。

这次罢工的时候，向警予刚刚回国不久，她参加了这场斗争，作了不少工作。

罢工失败后，为了支援丝厂女工，解决他们暂时的生活困难，向警予组织一批知识妇女上街进行宣传募捐。她讲话有很重的湖南口音，为了使讲演有更好的宣传效果，使听众都听得懂，她抓紧一切机会苦练普通话，有时还到江边对着江水练嗓子，在家对着镜子练手势。上街宣传募捐时，她手里拿着一个装钱的竹筒，走到热闹的街口，找店子里借条长凳，站到凳子上就讲起来，并带领其他女工同志一起参加了宣传募捐的活动。

1923年10月，资本家无理增加工时，每日女工作工长达12个小时，又加夜班3个小时，而工资反而减少，在这种残酷剥削压榨之下，丝厂女工筋疲力尽，相继死亡，生计日艰，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面对这种状况，向警予更加大声疾呼地号召丝厂女工团结，不能服服贴贴，听天由命，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她告诫女工，什么官厅也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大家的团结。

在向警予的领导发动下，1924年6月，上海闸北区丝厂女工举行了罢工，接着全市丝厂纷纷响应，上万名丝厂女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大罢工的前奏在1924年1月。1月，上海丝厂女工协会成立。这是女工们进一步团结的象征。资本家却视为眼中钉，阴谋搞垮这个团体。他们看到参加这个组织的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江淮籍女工，于是采取开除江淮女工的恶毒手段，妄图瓦解工人队伍。在新年开工的第一天，宝康丝厂资本家挂牌将所有江淮籍女工一律开除。全厂女工闻讯，十分气愤，大家一起去质问资本家。资本家勾结警察，抓走女工6名，激起了女工们更大的愤怒。接着，厂方又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阴谋裁减女工，降低工资，延长工时。虹口同丰永纱厂、元丰丝厂、新闻路慎昌等厂的工人，也同资本家进行了斗争。6月，资本家们无理地议决工人工资每日至多3角2分，比1925年又减少3分。这样一来，女工们处境更加恶劣，简直到了不是累死，便是饿死的地步。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出路，罢工终于爆发了。

这次罢工，由于有党的直接领导，声势和规模都比1922年更大。工人们比以往更团结，因而战斗力更加强大。丝厂资本家在汹涌澎湃的女工罢工怒潮面前十分惊慌。他们采用种种手段，妄图破坏这次罢工。女工们在向警予的直接指挥下坚持要求，决不后退，她们提出的口号是：“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罢工坚持了10多天，得到上海各工厂工人的有力声援，最后终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九、“革命的妈妈”

作为妇女运动先驱者的向警予，不仅领导了女工运动，使女工罢工从经

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而且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妇女运动的干部，引导她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以后，向警予动员上海大学等学校的女学生创办了几十所工人夜校。通过夜校，知识界妇女与劳动妇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帮助女工学习文化，参加女工的罢工斗争，启发女工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和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

丝厂女工中江浙人最多，为了便于和女工们接触谈心，向警予不仅练习普通话，还抽空找王春熙学习上海话。学了一段时间，能够听懂一般的上海话了，还能唱一些工人中流行的歌曲。

“在中国共产党中，警予时常被人称为‘向大姐’，或‘革命的妈妈’”，蔡畅这样回忆向警予。的确，无论在革命同志间还是在家里，她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的妈妈”。

1922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回国后，蔡畅和葛健豪老人还在法国。1923年初，蔡畅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和李富春结婚。

同年年底，蔡母葛健豪带着蔡畅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国。1924年5月15日，向警予在湘雅医学院生了男孩蔡博。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工作，她又把蔡博委托蔡和森的姐姐蔡庆熙哺养。这时，蔡母和向警予、蔡庆熙，还有蔡妮、李特特及蔡庆熙的女儿刘昂都住在一起。

蔡和森和向警予的革命工作很忙，除了和当地党组织研究工作外，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写文章，还抽空给大家讲形势。家里人特别爱听他俩的谈话。

一天晚上，在月光下，全家人坐在一起谈话。向警予亲热地对蔡庆熙大姐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大孩子要姐姐你带着，小的也要你带，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只好连累姐姐了。”蔡庆熙说：“为了你们能安心革命，这些事我都可以做”。

从随同儿、女、媳妇一道去外国起，蔡母葛健豪始终是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的。无论是在家或是在留法的湖南青年同学中，葛健豪老人都受到尊重。她很关心革命的前程，对向警予说：“你们做的事呀，是对的！我们一家子都是赞同的。现在，旧政府有权有势，你们怎样才能把它推翻呢？”

向警予回答说：“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我们更多地做工作，要宣传，要发动工农大众，要让千百万人都知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改造中国。别看我们现在人少，贫苦大众总是多数。只要大多数人都懂得要解放，我们的事业就能成功。”

葛健豪老人听了，很高兴地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

刘昂当时才十多岁，她后来无限深情地回忆舅母向警予这次月下谈话说：“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夜晚。警予同志每句话，都是我当时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在那风云变幻、荆棘遍地的年代，这些对革命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话，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一直鞭策我前进。”

在长沙的这段日子里，向警予见蔡庆熙大姐每天要带两个孩子，又要洗衣做饭，心里很不安，总想帮她分担一些。于是，她自己就带妮妮睡觉，妮妮喜欢哭，总哄不好，有一次一连哭了几十分钟，怎么也哄不好。向警予急得束手无策。她感慨地说：“我以为干革命是困难的，现在看来带一个孩子也很困难。”这一晚，她很难受，连晚饭都没吃。

平时，看到蔡庆熙做菜弄饭忙不过来，向警予总想抢着多做些事，但又不知从哪里做起。为了减轻大姐的负担，有时她帮着煮饭。但她进进出出，边做饭又边考虑工作，常常忘了时间，揭开锅一看，饭烧糊了。她端着一锅发出焦味的糊饭，忍不住笑了起来，“唉，我连这点事都不能做。”

向警予是革命的新女性。作为同志、战友和妹妹的蔡畅最了解她。她是这样描述向警予的：“她是一个勇敢的革命者，但她的生性是十分仁慈的。她不仅对同志和同学很好，就是其他的人，她也帮助他们解决了各种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女人没有衣服，而警予又只有两件时，她必分一件给她。她有着非常坚韧的意志，固执而且顽强，跟人争论问题，她的意见很难得改变，然而，她虽有着坚韧的意志，却又合理的控制着她的感情。”

离开长沙之前，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两个幼儿。外甥女刘昂已经10多岁了，向警予特地送给她一本舅舅编的《社会进化史》，勉励她好好学习，接近工农，长大了为劳苦大众谋解放。

向警予是一位革命的母亲。她热爱自己的家庭，更热爱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的家庭；她关心自己的孩子，更关心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孩子。为了全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幸福，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向警予！

斗争在召唤着她，她又回到了上海。

十、“五卅”风暴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中央机关所在地就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三曾里。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普通房子，既是中央办公的地点，又是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家的寓所。毛泽东住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住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半年后，杨开慧从湖南来到上海，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三家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对外化名为“王姓兄弟”，称向警予为“大嫂”。毛泽东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罗章龙任中央秘书和宣传工作。经常来的同志称这里为“三户楼”。后来，罗章龙离开上海，毛泽东蔡和森两家又搬到慕尔铭路的甲秀里，仍住在一起。

向警予既是党中央妇女部长，妇委书记，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负责人，她贯彻“三大”关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在妇女界进行了很多工作。

向警予是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委员，又是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

向警予还发起组织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唤起全国女界的觉悟，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遍于各省各地，一面号召人民自动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根基稳固。在向警予等同志领导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在全国最为活跃，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

为了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向警予提议，经过党中央同意，组织了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达到30万人之多，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力的队伍。

革命风暴来临了。1925年2月，上海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5月14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再度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残忍地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杀伤工人10余人。这一流血事件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月28日，党中央召开会议。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央委员，除总书记陈独秀外，还有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蔡和森坚决主张领导群众前进。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的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党中央具体领导了这次震惊世界的反帝运动。向警予和恽代英领导妇女界和青年学生参加了这场斗争。

5月30日这天，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南京路英租界捕房前示威游行。大家呼口号，散传单，慷慨激昂，同仇敌忾。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的屠杀，使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越烧越旺。党中央于当天深夜开会，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反帝的统一战线，号召上海市人民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

向警予经常出席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她和杨之华等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妇女部，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白天带领妇女和学生到街上宣传募捐，晚上到工人夜校进行宣传鼓动。

在外国租界讲演宣传时，常遭到外国巡捕的棍棒驱赶和水龙头的疯狂喷射。向警予每次上街宣传，总是穿着雨衣，带着雨帽。当她讲演时，都是任水龙头喷射，等群众跑散了，才最后一个跟着走，身上水淋淋的，但换了一处，她仍旧讲演，帽子上的水不断地滴下来，她也一直讲下去。这种顽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听众。

上海大学的学生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向警予也参加和支持他们的爱国反帝活动。每次上海全市学生集合游行，上海大学的校旗，由两个人举着，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是复旦、交大等学校。各校学生组织讲演队，散发宣传品。大学和中学生每小组六七人，主讲的有1至3人，万一第一个被捕，由第二个学生继续讲；第二个被捕，第三个再讲。小学生则活跃在里弄和街巷。他们机智灵活地散发宣传品，有的塞进邮筒，有的放到商店柜台上。

“五卅”运动后不久，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向警予通过各地“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大力声援，还组织上海、广州、香港的女工数千名，直接参加了省港大罢工，成为省港大罢工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

十一、在苏联

1925年10月，向警予和蔡和森、李立三老同志一起，受党中央的派遣，从上海赴莫斯科。他们一行乘船到海参威，在船上渡过了十月革命节，船到海参威后转乘火车。他们到莫斯科时，已快到年底了。

蔡和森这次去苏联，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担任中国驻第三国际代表。

向警予到莫斯科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

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校址，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普希金广场。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专为国内少数民族和东方亚洲各国培养干部的一所新型学校。和这所学校同类型的学校，还有苏联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西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专为苏联本国和西方各国培养干部，都设在莫斯科。

东方大学分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印度班、越南班，为中日朝蒙印越等国培养干部。后来还办了中国工人班，为中国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到中国班学习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是在1921年去的。这批学员中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

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后来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合并，校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

向警予有机会到苏联，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一年多。她在巴黎公社的故乡渡过了两年的战斗生活，现在又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给她不平凡的革命经历增添了新的一页。

东方大学中国班共有四五个小班，每班人数不等。平时除上课外，学员以自学为主。大家学习共产主义常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开展热烈的讨论。很多学员在国内就已经知道向警予的名字，对她很尊敬。据同一时期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张仲实回忆：向警予在这里学习期间，谦虚好学，平易近人，大家都很喜欢她。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3月13日，全会的第18次会议上，举行了隆重的向中国女工献旗活动。苏联伏罗涅斯州的工农妇女代表苏波特尼柯娃向中国的上海革命女工赠献红旗。向警予出席了这次献旗活动，代表上海和全中国女工受旗，并致答辞。她说：“同志们！我以上海和全中国女工的名义向伏罗涅斯州工农妇女表示热烈的感谢！”

“上海纺织女工是最早起来与中国工人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中国工农妇女身受三重压迫：军阀、帝国主义以及家庭和封建残余。然而这些压迫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女工将加入中国无产阶级的行列，消灭外国和中国刽子手的压迫和剥削。苏联工农劳动妇女的光辉斗争是我们的榜样，它鼓舞我们奋斗。”

“同志们！这面红旗是中国和自由苏联的劳动妇女团结一致的象征，它鼓舞中国妇女进行斗争。全世界劳动妇女相互声援万岁！”

十二、支持秋收起义

1927年3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回国，投入于党领导的大革命的洪流中。

向警予先到广州，住在邓颖超家中。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邓颖超在广州工作。一批批革命青年来到这个大革命策源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女青年们经常到邓颖超家里来。向警予在广州停留期间，和邓颖超一起，热情地接待这些女青年，和她们讨论革命形势，向她们宣传革命思想。

从广州到武汉途中，向警予顺道到长沙看望了蔡母葛健豪和几个孩子。

向警予一到长沙，不顾旅途生活的疲乏，就约了几个女友聚谈，介绍苏

联的见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论述妇女解放的道路。晚上，她才和家人团聚。

葛健豪很疼爱向警予，想留她在家多住几天，3年没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

临睡前，外甥女刘昂给她倒了一盆洗脚水。只见向警予脱下长统皮靴后，穿的却是一双土布厚袜子。刘昂连忙拿来一双洋袜，要她换一换。她笑了笑，对刘昂亲切地说：“你看，我这双袜子很好嘛，还可以穿很久，我很喜欢穿这种袜子。”洗完脚，她又穿上了原来那双厚土布袜。

第二天，她就和亲人告别。

葛健豪老人带着孩子们到车站送行。向警予依依不舍地和老人幼子分手，挤上一列去武汉的货车，又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到武汉后，她一直惦记着长沙的亲人。她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在另一封信中，她给孩子们附了几首儿歌。有一首是这样开头的：“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

有一次，她还给蔡妮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这些书信、儿歌和诗句，对革命后代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对祖国的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内心世界！

向警予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来到武汉的。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

4月27日，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警予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

形势一天天恶化。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接着，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15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作，蒋汪合流，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野蛮的大屠杀。

在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力量向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继续斗争的旗帜。

紧接着，8月7日，在大革命紧急关头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蔡和森、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任弼时、邓中夏、陈乔年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职务，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并且制定了新的路线，这就是土地革命和反对国民党的总方针。

在白色恐怖的黑风恶浪中，向警予转入地下斗争。这时，她从市总工会调到省委工作。每天，她身穿黑布褂，粗布裙，像小学教员一样，开展秘密工作。她经常扮成家庭妇女，手里拿着针线活，到工人家属区活动。她还到工人支部参加会议，组织训练班，编印学习材料，每天忙到深夜才合眼休息

一下，第二天清早，又投入工作。

向警予深刻了解当时全国所处的形势。她懂得，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遇到挫折之后，毛泽东等同志正领导湖南省委准备秋收起义时，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有一支忠于革命的部队，作为广大农民起义部队的中坚力量。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由共产党人卢德铭、辛焕文等领导，是我党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排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战士都是工会、农会骨干，何长工、杨得志、张平化等同志都在这个团。卢德铭在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在北伐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领的警卫团奉上级指示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受国民党张发奎部的拦阻，错过了时间，部队折回，在江西修水待命，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与上级党联系。这时突然接到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通知，要他们3个主要负责人离开部队，马上到广东去，把部队给别人指挥。卢德铭感到不好作出决定，于是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到武汉找党中央。

在武汉，他们才得知党中央已经迁往上海，就找到湖北省委秘密机关，见到了向警予。

向警予代表省委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准备搞秋收暴动的计划，坚决否定了夏曦要他们放弃部队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要抓紧和湖南、江西两省委联系，直接找到正在准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考虑到卢德铭等工作的困难，省委拿出2000块银元，给他们作活动经费，还派了6名工人骨干，协助他们工作。为了顺利地赶回修水，向警予还和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在路上避开敌人。她反复交待，到了修水，就要立即派人与毛泽东联系，尽快使警卫团部队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

卢德铭等人到了修水，很快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秋收起义部队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卢德铭带领的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组成第一团，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卢德铭担任团长兼秋收起义总指挥。

向警予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给予的坚决有力的支持，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

后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的胜利消息鼓舞了向警予，使她更坚信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她坚定地充满白色恐怖的武汉继续坚持斗争。

十三、大浪淘沙

向警予在环境险恶的武汉坚持工作，经常深入到工人们中间，教育和鼓舞革命群众，并接受省委的指示，担任了党的秘密刊物《长江》的主编。

由于斗争环境的严峻，暗探开始注意她了，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武汉。在这严重的时刻，向警予却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临危不惧，履险如夷的心胸和气魄。

敌人的搜捕，叛徒的告密，时时刻刻威胁着向警予。

1928年1月下旬的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向警予还在工人家里和负责地下区委工人工作的张金保接头，商量第二天的活动。张金保见她的衣着一点不

像过年的样子，很替她担心，连忙对她说：“警予同志，你这身打扮挺危险，不好出去，还是换件衣服吧！”她说：“不要紧，只要我们内部没有出叛徒，敌人是抓不到我的！”

按习惯，过年的时候，总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点喝点好的。可是，向警予和张金保被敌人紧紧盯梢，有时一天连一餐饭也吃不到。大年三十没吃饭，走在街上，闻着家家户户饭菜的香味，肚子里更是饥肠辘辘，饿得发慌。直到第二天，大年初一，她们在华康街萧家接头时，才吃了几根油条。当她们离开不久，和她们接头的一位青年同志，就被敌人捕去，惨遭毒打。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有中流砥柱的真正革命者，也有贪生怕死的懦夫。一小撮叛徒，就像大浪中混杂的泥沙，泛起的沉渣。地下交通员宋若林就是这样一名可耻的叛徒。

宋若林的家在湖南浏阳，父亲是大地主，清乡团的头目。北伐战争前，他来到武昌旅鄂中学，并混进了革命党。北伐军攻入武昌，他还带领学生队伍，到驻地慰问伤病员。但是，“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吓破了胆，连忙跑回湖南老家，不想再干革命了。后来，父亲给他弄了一个身份证，要他回武昌拿行李。在岳阳碰见了同班同学黄五一。黄五一这时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工委书记，他劝宋若林一起参加地下活动。宋若林勉强跟着黄五一，住在汉口海寿里。

黄五一领导了一个地下支部，共有7个党员。宋若林担任交通员。

年关暴动计划暴露之后，黄五一离开了武汉，春节前，他又回到汉口。他和向警予之间的联系，也由宋若林作交通员。约定的暗号是每逢礼拜日黄昏时刻，宋若林到三德里巷口和向警予会面。

不久，黄五一被捕。宋若林和同一个党支部的唐才佳，慌慌张张地转移到另一个旅社，准备到湖南去，因为没有路费，暂时留在汉口。

原来，黄五一被捕前，曾要宋若林经常到东方旅馆走一走，看旅客牌上有没有“夏明”这个人。“夏明”就是夏明翰，是中央派到湖南担任省委委员的。宋若林和唐才佳跑到东方旅馆，见到客牌上果然有“夏明”这个人，忙告诉他黄五一被捕，并向夏要了些钱。离开旅社后，在街上闲逛，结果被叛徒发现，全部被捕。

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宋若林这个软骨头叛变了。

他出卖的第一个同志就是夏明翰。

夏明翰来到汉口，到处打听地下省委的同志。有一天，他找到谢觉哉的住处，对谢说：“省委机关多被破获，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乱走，要碰上人。”谢马上说：“危险，赶快搬！”

但是，夏明翰还未来得及转移，由于宋若林的告密，3月18日被捕，3月20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牺牲前，他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敌人千方百计地打听向警予的住处，要逮捕这个著名的女共产党员。

就在夏明翰牺牲的时刻，刽子手把宋若林捆到刑场陪斩。宋若林吓得缩成一团，魂不附体。这个卑微的小人，供出了向警予的地址。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就在夏明翰牺牲的同一天，向警予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这天，一群武装匪徒，包括法国巡捕房密探、巡捕，和伪武汉卫戍司令部稽查等，由叛徒宋若林带路，冲进法租界三德里96号，蜂拥上楼，逮捕了

向警予。他们翻箱倒柜大肆搜查，连衣服一件件抖开来看。由于向警予事先销毁了文件，做好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匪徒们一无所获。一个法国包探狡猾地对向警予说：“跟我到捕房去，问你们几句话，便可以回来。”一出门，几十名匪徒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把她押到巡捕房，关在拘留所。

十四、在狱中

向警予被捕后，反动派欣喜若狂，当时的报刊几乎天天都作为头条新闻大肆宣传，作为国内要闻加以报道。

巡捕房拘留所紧靠巡捕房右边，是一间单独的房子，外面一大间，进去是一条小弄堂，两排牢房相对，每排3间，都有铁格门。向警予被关在右排第一间。

在巡捕房，向警予严词质问法官：这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自由呢？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

牢房里十分阴暗，水泥钢筋建成的拘留所充满阴森森的气氛。向警予身上除一件棉袍外，什么也没有，日夜冻得发抖。晚上就把捕房发的4条破烂棉毯子，垫两条，盖两条，用自己的鞋子做枕头。每天饿到下午2点，才能吃到一餐饭。

4月12日，二三百名武装匪徒，如临大敌，押着向警予，从法国巡捕房看守所出来，沿途岗哨林立，十字路口都有军警把守。她被关进了军法处监狱。

军法处监狱在汉口余记里，全里弄的房子都被充作牢房。监狱里阴森寒冷、臭气熏人。地板上臭虫、白虱成群。“犯人”吃的是霉米烂菜，喝的是半开的水。

监狱中，向警予每天起得很早，看看自己喜爱的古诗，经常与难友谈话。她说：“革命者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还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争。大家都把她当成自己的亲人。

她想写一本自传，为党留下些斗争史料。但她懂得敌人的狡猾，万一自传带不出去，落到敌人手里，会暴露党的机密，加之纸张困难，终未能动笔。

在狱中，她常常想起自己心爱的孩子，就把保留在身边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拿出来，或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她对着照片深情地说：“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听见吗？”但她想到党的事业，想到组织上会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心里坦然了。

这时，蔡畅得知向警予被捕，托人接湖南蔡母去上海，路经武汉时，蔡母多么想到监狱探望亲人呵！护送的同志劝阻说：“不能去，去了会暴露身份，去上海更加困难。”蔡母考虑到革命的整体利益，忍痛带孩子去了上海。

敌人对向警予进行多次审讯。

一次，伪法官装出一付十分同情的伪善面孔，对她说：“你太可惜了，你是中国了不起的妇女，只要你弃暗投明，前途是光明的。”向警予横眉冷对。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

又一次审讯，法庭戒备森严，杀气腾腾。4个反动法官对她凶相毕露地说：“我们已查明你就是向警予，是共匪的重要领袖，你不承认也无用了。”

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由你选择。”

向警予坚贞不屈的答道：“不要多讲废话，要杀就杀！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更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人民的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你们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敌人无计可施，十分狼狈。只好把叛徒宋若林拖出来。向警予怒不可遏地痛斥宋若林：“你这个民族败类，还有脸呆在这里。我为党的事业而死，虽死犹生。而你活着只是一条癞皮狗，死了遗臭万年！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

向警予被捕后，蔡和森正在上海，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曾竭力想尽办法营救她，结果都失败了。

有几个留法时的女同学曾到监狱探望她。大家出于同学的友情，对她的生死很关心。而她却态度自然，若无其事，大家着急地说：“警予，你疯了，此乃你生死大事，何以毫不在乎？”她冷静地回答说：“我是不在乎，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主义牺牲，我视死如归。”她们感到非常惋惜，不明白为什么她对生死如此淡然。

确实，向警予崇高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和气节，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视死如归的精神，不是当时一般人甚至留法的某些同学所能理解的。

十五、英勇就义

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都不能动摇向警予的坚定信念，不能从她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因为她是工人们敬爱的领袖，在群众中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工人们准备来一次劫狱，营救向警予。反动派决定选择“五一”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杀害向警予，妄图“杀一儆百”。

5月1日清晨，向警予起得特别早。她穿上一件油绿色的旗袍，在熹微的晨光中迎窗而立。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轻轻地对同伴说：“‘五一’国际劳动节，记得吗？”同伴们点点头。她又默默地望着窗外，纪念着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

这位为中国劳动妇女，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每逢五一节，心情都很不平静。

突然牢门打开了！一群匪徒走进来，大声吼叫：“向警予！”向警予整了整衣服，昂然走出了牢房。

反动派在全城宣布戒严令，一切商店全都被迫关上店门。在去刑场的路上，许多警察和宪兵严密地警戒着。人们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

向警予一边向群众演说，一边高唱《国际歌》，并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歌声和口号声，像划破长空的闪电，像震撼山河的雷鸣，在武汉街头回荡……

宪兵们凶狠地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敌人在她的嘴里塞了石头，又用皮带缚她的双颊，街上的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人越来越多，形成了悲壮的送别场面。

向警予被押到余记里后空坪刑场，她用深情的目光环视周围悲愤的群众，满怀战斗的激情向大家最后告别：

“同胞们，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向警予！反动派就要杀死我，可是，革命是杀不完的。同胞们，起来吧！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革命很快就要胜利！”

“中国共产党万岁！”

她含笑就义，壮烈牺牲！

当天深夜，老工人、共产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把向警予的遗体背上小船，掩埋在汉阳龟山下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边。

向警予英勇就义的消息震动了全国。

党中央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蔡和森写了悼念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对向警予作了高度评价。

1939年“三八”妇女节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期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苦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1939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花木兰、秦良玉、蔡文姬等，还要学习现代历史上的女英雄秋瑾、何香凝、向警予。她们是中国妇女的模范。后来，周恩来还说，向警予是我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为革命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

向警予曾经说过：“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给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表彰先烈，激励后人，在纪念向警予烈士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的日子里，邓小平在《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里，亲笔写了“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的题词。

如今，向警予烈士的纪念碑，高高矗立在长江汉水汇合处的龟山之顶。烈士的忠魂安息在英雄的江城。这里，青松翠柏，碧水蓝天，山花竞放，江水长流，烈士的英名和业绩，将千秋万代，彪炳史册，为人民永远传诵。

在向警予的故乡——湖南溆浦，她亲自创办的“溆浦学堂”，现已改名为“警予小学”，烈士亲手栽种的大樟树，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向警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